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研究文集

World Polit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秦亚青◎主编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研究文集

WORLD POLIT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秦亚青◎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研究文集 / 秦亚青
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12-4588-8

I . ①世… II . ①秦… III .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 ①D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6224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研究文集
Shijie Zhengzhi Yu Quanqiu Zhili—Guoji Guanxi Yanjiu Wenji

主 编 秦亚青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毫米 1/16 30印张

字 数 46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88-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高校教书已30年，教授国际关系理论这门课程也有很长时间了。作为一名教师，最感欣慰的莫过于教出了一批学生。尤其是教过的博士生，他们毕业之后，大多也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每次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感到学术薪火的传承，都会因此感到高兴激动。现在他们也成为教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的执着和事业的承担使他们笔耕不辍。今年得以选取他们的一些论文汇集成册，抚卷浏览，颇有感触。多年问学，多年教学，偶有心得，随笔写下，权作这本集子的一个序言。

一、艺术之魂、科学之道

做学问的要领当是“艺术之魂、科学之道”。

我喜欢艺术，比如诗词歌赋、绘画雕塑。闲暇之时，也愿意走一走博物馆。欣赏艺术，是一种享受，享受艺术作品的风采神韵，也感受艺术家的奇思妙想。由此想到了艺术之魂。艺术的灵魂就是天马行空的思想驰骋，不受任何拘束，不惧任何权威，不惧任何羁绊。这种思想驰骋，成就了艺术大师，成就了非凡的作品，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独特，成就了流传万世的作品。读李白的诗，眼前是上天入地的精灵；看毕加索的画，心中是鬼斧神工的意象。做学问，首先需要的大概就是艺术之魂。简而言之，艺术之魂是艺术中的自我的灵魂、自我的思想。我时常提醒自己并时常告诉学生的是，研究要有自己的思想。博

士论文，首先看重的是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融在里面。虽然任何创新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之上，都是受到前人研究的启迪而产生的，但这一点自己的思想必须是你有而别人没有的，恰恰是以我注六经气度表现出来的这一点思想构成了整篇论文的灵魂。艺术的灵魂有的时候可能远离现实，但是永远清新、永远独特、永远闪烁着令人眼前一亮的灵光。艺术的灵魂也就是学术的灵魂。

当然，学术研究，只有艺术之魂还是不行的，“科学之道”也非常重要。我所说的科学之道不是科学的原理，不是唯科学主义，更不是只有以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做研究才是科学的，而是要遵循学术规范，将驰骋天地之间的思想以学术的规矩收拢起来，成为严谨的学术产品。偶读《历代状元试卷》，翻开后竟不能释手，因为这些文章写得真是精彩，起承转合、问析思辨，行云流水，字字珠玑。反思八股，实际上是确立了一种写文章的形式，要求做这种文章的人按照固定的形式和规范去写，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把握内容，比较高下。其实，学术规范也是如此，要求研究人员依照一定的规范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述出来，使作者和读者比较容易地把握其问题、其观点、其推理、其结论。我所说的科学之道，就是这种学术规范。有人说，八股写不出好文章，实则不然。都是在八股的框架之中，那些状元试卷的开题如此清晰，观点如此鲜明，分析如此深刻，结论如此明确，篇篇都是立意新颖，言之有物。所以，使人写不出好文章的是思想八股，而不是文体八股。学术研究也是一样，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有批判意识的文献梳理，有鲜明自我的观点命题，有全面深刻的分析论证，有言简意赅的研究结论，这些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要素。艺术的灵魂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羁绊，科学的精神需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有人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中国古人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大约也都是表达了与艺术之魂、科学之道相近的意思。

二、人类为体、天下为用

做学问的气度当是“人类为体、天下为用”。

西学东渐以来，中学西学何以为体、何以为用似乎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困惑和久争无果的辩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困惑和辩论中学知识教学生做学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在面对西方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时期对西方现代文明刺激的一种反应，是对中西文明关系的一种思考，也是对知识生产的一种态度。其后出现的西学派、中学派及其争论一直不断。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不论话语重心表现在什么样的具体领域，这种争论的焦点似乎总是有着体用的影子。“西方中心论”是近现代形成的一种观念。由于西方在近现代历程中的迅速发展，在理念、制度、科技等方面的创新，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以优势文明的形态迅速扩散，西方在学术领域和知识生产方面的优势也彰显出来。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要生产新的知识，无论是体用的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显然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以全球的视野去审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去发现人类的共同关切、利益和价值，去凝练不同文明中的精粹，为创造一个新的开放性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需要重构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方式。如果仍然使用体用的概念，那么，“人类为体、天下为用”当是应取的态度。

“人类为体、天下为用”为新知识开拓了天地。学术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国际关系学本来就是一个后起学科。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更晚，也依然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要想创新，就要有“跨东西文化、做天下学问”的胸怀。当今世界，知识传播和知识生产已经超越了“中学西学”的体用问题，已经跨越了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分立的状态。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30年的历程见证了又一次西学东渐，但这一次却有着更多的中国关怀，包含了更多的中国问题，孕育着更多的中国学人。

“人类为体、天下为用”提倡的是开放的思想。开放的和开放的思维体系永远是创新的不竭源流。两千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中心的思想家为人类生产了不朽的知识，奠基了知识的大厦；五百年来，则主要是西方思想家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人类的创新作出了贡献，这些思想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近现代的中国，从严复那一代人起，我们就开始了学习的过程，今天我们仍在学习。正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使我们能够认真地学习，并在学习中不断成长，不断发展，不断建设我们的学科，不断思考有着学术意义的问题。

但是，这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是与创新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创新的意思，学习的结果恐怕只能是确立和巩固已有的话语霸权。许多先哲都提醒人们，学术的“齐一化”是危险的。有位中国学者在研究庄子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评论：庄子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万物之上，从不人为地强求千篇一律。庄子反对这种违背天下之常然，违背万物性命之情的做法。如果现有的理论都完美无瑕，如果现有的学术巨匠都无懈可击，那么，学术的进步就停滞了，学术的历史就终结了。在国际关系领域，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一些非主流的理论，都在努力创新，都在艰难地探寻新的知识增长点。在欧洲，学者们不断思考欧洲的实践，不断挖掘欧洲的经验，积极展开跨大西洋的学理论战。在亚洲，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讨论国际关系的学术创新。这是因为，所有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都是可以改进和推翻的。也正因为如此，学术是不会停滞的，历史也是不会终结的。

我提倡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道理，也都有自己的不同视角。实际上，中国学派更是一个符号，它的意义是唤起学人将中国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使迄今为止未被发掘出来的思想璞玉放射光彩，贡献于国际关系乃至人类知识的宝库，使知识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理想中的创新是在理论构建和推理方法上借鉴西方严谨系统的知识生产，在思维理念和审美取向上贴近中国礼乐情感的文化灵魂。我希望以创新意识挖掘传统，

以反思精神借鉴西方，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定势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人类为体、天下为用”。也正是在这种全球视野和人类的关照之下，知识的生产才不是用一种知识话语替代、征服、消除其他话语，而是一个自我和他者相互学习和借鉴、互为生成条件、互为变化条件、形成新的知识合体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美美与共”、共同进化的过程。

三、学如其心、文如其人

做学问的根本当是做人。

中国人历来认为，要学做学问，首先学做人，因为“学如其心、文如其人”。学如其心。一个人学问是否可以做大、做出气势、做出新意，首先要看这个人的胸怀气度。心多大，学问就可以做到多大。心的支撑是理想，做学问的一个原则是求真，但是做学问的人的一个原则是求善，也就是要有向善的理想。北宋哲人张载曾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后人有许多诠释。我无意讨论这些不同的见解，因为读横渠四句的时候，我首先不是思考这四句话的本意，而是被张载的气势所震撼，为他的境界所折服。冯友兰先生说得对，这四句话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之所以有气势，之所以有境界，是因为有理想，理想才能使心向往之。不论是哪一个学科的学者，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需要以理想为准绳的，否则就没有气势和境界可言。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理想是世界和平，这也直接契合了张载的最后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

国际关系作为学科的开始可以追溯到英国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这个教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而威尔逊在国际关系学领域最重要的遗产是理想主义。一战对人类生命的残害使得有识之士希望设计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使世界免于战争之苦。当时，威尔逊是美国总统，美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威尔逊的名字是与“国联”联系在一起的，威尔逊遗产中最典型

的是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这是对强权政治和大国恶性博弈反思的结果，也是希望通过某种国际安排和制度防止战争、保障和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最为“现实”的国际政治领域，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却是试图改变强权政治现实的理想主义。虽然理想主义中有着不少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国联的许多活动失败了，但世界和平却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的崇高理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方向和真诚愿景。

人们往往认为，政治现实主义是没有理想的。霍布斯的现实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卡尔的现实是强权政治的舞台，是不允许乌托邦存在的角逐校场；摩根索的无政府世界是为权力斗争的生死场，是没有普世道德只有国家利益的利己主义天地。其实，这只是现实主义学者的一个方面。如果认真阅读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面。爱德华·卡尔是第一个将国际关系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论述的学者，也被公认为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重点批判了一战和二战之间乌托邦思想的泛滥，但是他也没有忽视理想，即便是在对乌托邦主义的尖锐批判声中，他也提醒人们要将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因为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是贫瘠的，“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于理想与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摩根索将其写在副标题中，那就是“和平”。摩根索生长在一个国家纷争四起，欧洲战火不断的时代，这使他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权力的诱惑和利益的冲突使得国家间政治充满了斗争。但是摩根索的目的仍然在于发现通向和平的手段和路径，即便是在强调为权力的争斗之中，他仍然没有忘记和平的理想，没有忘记探求实现和平的手段。

文如其人。一个人写出来的文章，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剽窃，就会隐含着他的灵魂，看到一篇文章，就像看到了写文章的人，看到一个学者，也就会想象出他所写的文章。人的支撑是道德。道德文章，两者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同为一体，中国往圣先贤的总结确实很有道理。道德品行端正，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端正。

再回到国际关系理论，摩根索对道德的认识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可

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认为作为个人和作为国家的道德是不同的，作为个人的道德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道德，而作为国家的道德却是以国家利益所界定的。这是我最不赞成摩根索的地方。这种观点会使人们想起马基雅维利，想起这位哲学家的名言，只要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实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试想一个人如果时时事事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权衡计算，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和行为守则，那么这个人一定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处处收益，而更可能是人人鄙视了。

孔夫子最喜欢的学生当是颜渊，孔夫子最喜欢颜渊的地方，就是他的道德执着。道德铸就了颜渊，道德就是颜渊。正因为如此，当颜渊先孔子而逝的时候，孔子才如此地悲痛，发出了天丧予的悲叹。颜渊可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也可能不是最睿智的学者，但是，他的德行成就了他的作为孔子大弟子、位列孔门贤人之首的学问灵魂。现实主义的观点是国家的道德不应当等同于个人的道德，如若这一观点为真，则国家就和它的人民完全分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国之道德与民之道德原本相同相通，因为这两者之间原本就是一体的。没有国家的道德，何谈民众之道德？国之利益与民之利益原本也是相同相通的，没有人民的利益，何来国家的利益？道德和学问也是一体。没有道德的学问犹如断线的风筝，可以飘得很高，但却永远不知飘向何方。

重视理想道德，不等于不关心现实，不等于不寻求利益，而是要在心中有理想的情操和道德的底线，这样的理想和道德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且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现实，这样的理想和道德造就了包含理想和道德的学问。我希望学生们有理想。他们研究的是国际关系，所以，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在他们的信念体系中，他们的理想应该是世界和平，且是“为万世开太平”。我希望学生们有道德的承担，用道德支撑起做学问的天地，也用道德支撑起心灵深处的人格。

秦亚青

2013年10月22日于京西厂洼

目 录

Contents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	1
权力分配、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以联合国为例.....	贾烈英	32
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	苗红妮	70
气候变化与中国政治.....	陈 刚	87
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	高尚涛	101
对大国如何影响地区规范构建的理论分析.....	赵乾坤	130
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李晓燕	141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与意义的建构		
——伊拉克战争解析.....	孙吉胜	156
第二轨道进程：清谈、非正式网络与社会化		
——以东亚思想库网络为例.....	魏 玲	185
博弈论与战略互动.....	陈 宏	204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实用主义争论.....	刘 慧	229
从量子政治到关系本位：超越“二元分立”.....	董青岭	239
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	韩志立	257
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	季 玲	276

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

——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景晓强 297

非对称需求困境：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需求博弈..... 刘伟华 314

关系治理与制度治理..... 柳思思 334

身份干扰与行为偏失

——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考量..... 李 敏 350

行为体策略与规范传播

——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例..... 谢婷婷 369

武装组织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动机与应对..... 颜 琳 389

规范竞争：谁的规范重要？

——一个被忽视的研究议程..... 何 银 403

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 冷鸿基 421

博弈论与语言游戏

——国际关系中两种游戏研究方法之比较..... 尉洪池 443

后 记..... 461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元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体系层次，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开始，相继出现了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984）和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2000）。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现象，但是，它们又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要素：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结果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却没有“关系”的地位，也鲜有“关系”理论，这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重大缺失。实际上，过程和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过程包含关系，关系建构过程，过程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关系，关系的运动形成了过程。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几百年来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结果会呈现什么样的理论取向呢？本文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①即采纳建构

*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本文发表在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

① 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中的进程因素》，载《中国书评》，1998年第13期，第5—18页；Qin Yaq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Process-focused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吸收社会学关于社会性关系的论述，但其内涵要素则是中国的核心理念——关系性，亦即过程中的关系和关系中的行为体。^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核心假定，目的是在形而上层面勾勒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

一、社会过程与社会性关系：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缺失的要素

为了清楚地发现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缺失，我们需要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过去30年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的元理论主要是三种体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② 这些理论都试图在国际体系层面构建理论体系，讨论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而每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发现和补充前一种理论的不足上面作出了贡献。比如华尔兹提出了“结构选择”命题，认为国际体系中的物质实力分布（亦即结构）决定了国家的冲突或是合作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发现，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体系权力分布决定体系单位行为取向——不能解释体系权力分布保持不变情况下的单位行为变异，比如在两极体系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之间既有冲突，也不乏合作。因此，提出了体系层面的另外一个影响体系单位行为的要素——国际制度，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强信息透明、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促进国家的合作行为，弱

^① 过程建构主义主要借鉴的理论包括：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关系的论述、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者关于中国传统中对关系的理论化成果。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pp.335-370;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 No.2, Sep. 1997, pp.281-317;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5, No.3, 1999, pp.291-332;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化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① 结构建构主义也是发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另外一大缺失，即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布，然后才发展了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以国际体系观念分布或曰国际体系文化替代了华尔兹的物质权力结构，认为国际体系文化构建国家身份认同，并因之影响了国家的行为，形成了一种以观念结构为核心变量的体系层次理论。^② 所以，发现缺失，就可能撕开理论研究的突破口。

体系理论的缺失仍然存在。首先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将国际体系视为无政府体系，将体系中的行为体视为各自独立的单位（主权国家）。这样就预设了一种原子论假定，即单位是构成体系的最小成分，单位之间的互动依靠外来力量的推同。这也就是弹子球比喻：每一个国家都是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互动，并因之产生某种结果。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国际体系又呈现单极或多极格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行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物质力量分布的状态足以决定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以及主要国家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③

新自由制度主义审视了国际体系与单位行为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基欧汉认为，如果依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推理，国际体系的物质权力分布不变，国家的战争/和平、冲突/合作行为也不会变。但在实际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冷战两极体系中的苏联和美国，即便在最敏感的核军备竞争方面，也会出现合作的情况，在其他低政治、低敏感度领域的合作就更多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被削弱，使得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可以进行合作？基欧汉发现，是国际制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度在发生作用，由此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① 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选择”更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认为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促成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因为它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来说，这种互动就是过程。国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能还原到单位层次去寻找因果关系的，所以，最重要的因素是影响互动的有形的国际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他们是注重过程的。^②

结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在温特提出施动者—结构问题的时候，他试图强调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所以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双向互构也成为早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志。^③ 但后来温特为了发展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其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的形成，亦即体系层面的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核心因素，观念结构影响了单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并因之影响了它们的行为方式。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被称为“文化选择”，以有别于华尔兹的“结构选择”和基欧汉的“制度选择”。1999年《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问世，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也使温特理论成为单向建构理论，重点在于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并且这种观念结构更多地用“规范”来表现。所以，在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中，多是国际规范是如何传播、如何建构行为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专门讨论结构与过程的问题。他将过程定义为“单位之间互动模式与类型（patterns and types of interaction among its units）”，进而又将过程定义为“游戏是如何进行的（how the game is played）”。他认为结构与过程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参见[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③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6, 2004, p.351.

体身份和影响行为体行为的。^① 温特从双向建构转向单向建构说明西方体系理论学者很难摆脱线性思维的束缚，一旦开始考虑元理论，便开始了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因果推理。

应该说，这三种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都具有解释作用。但是，它们又都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关系。可以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将学科称之为国际关系，但却没有形成真正的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对关系性的重视程度最低，对过程基本不予讨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自己重视过程的，实际上仅仅将过程视为一种背景，视为一种行为体活动的场所，它最终强调的是制度，是过程的一种物化形式。一旦国际制度形成，国际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成为核心研究议程，国际制度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而过程则成为几乎完全不在研究范围内的黑匣子。^② 结构建构主义也强调过程。尤其是在温特早期的论述中，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被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施动者和结构本应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在互构中产生和互生。但是，到了温特全面构建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结构被物化，结构成为解释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原因，过程再次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场所或是一个舞台：虽然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而是不能脱离施动者和结构的依附性因素。^③

实际上，过程，或曰社会互动过程，是中国经验和思想中的重要

① 规范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的一个重点问题。参见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ward Keene,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British Treaty-making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 Spring 2007, pp.311-339; Mark L. Ha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action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 Policies, or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 Winter 2007, pp.145-179; Alexander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Fall 2005, pp.973-1012; Jeffrey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Fall 2005, pp.801-826。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对比温特的早期重要论文“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和他后来的重要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转向。参见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